

制造职业荣誉的象征： 中国官方新闻奖的制度实践（1980—2013）

黄顺铭

摘要

本文采取一种整合性的视角，把官方新闻奖同时视为一项关乎社会控制、文化祝圣和社会承认的项目，并运用田野数据和统计数据回答了制度演进过程、规则系统和评委的社会来源及其把关实践等研究问题。官方新闻奖始终按照一种国家支配模式在运行，即由扮演党和国家的代理者角色的专业组织来具体组织实施新闻奖的生产。双重赞助制度、推荐单位制度和挂钩制度一起构成了基本的规则系统，它们各有其社会控制功能。官方新闻奖一直有着稳定的评委来源，评委们的荣誉把关实践微妙而复杂。

关键词

官方新闻奖、职业荣誉、制度化、把关

作者简介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副研究员。本文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从业者的‘阐释共同体’”（项目批准号：13YJA860011）和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的资助。电邮：smhuang2006@gmail.com。
DOI:10.13495/j.cnki.c.jjc.2014.06.003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Honor: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Official Journalism Awards in China (1980-2013)

HUANG Shunming

Abstract

From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regards official journalism prizes simultaneously as a program of social control, cultural consecration, and social recognition. Using field and statistical data, it answers three questions concerning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rule system, and social sources of judges and their gatekeeping practices. Official journalism awards always operate according to the state-governed model—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serving as the agent of the party-state, organize and produce the awards. The rule systems consist of dual sponsorship, recommendation unit, and linkage, each of which exercises certain social control functions. The social sources of judges have been stable over time, and their gatekeeping practices of honor are subtle and complicated.

Keywords

official journalism award, professional honor, institutionalization, gatekeeping practice

Author

Huang Shunmi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Journalism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gram entitled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of Chinese Journalists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13YJA860011) and the program funded by basic research funding of Sichuan University (No.: skyb201205). Email: smhuang2006@gmail.com.

一、问题与方法

文化奖项提供了一扇观察文化场域如何想象荣誉、尊敬、承认、声望,以及名望等象征秩序的窗口。自诺贝尔奖被确立为一种国际性的现代文化制度以来,奖项已俨然渗透到了各种文化场域之中。学者们就文化奖项的研究形成了社会控制范式(Goode,1978)、文化祝圣(consecration)范式(Bourdieu,1984,1991,1993,1996),以及社会承认范式(Cole & Cole,1967,1973;Walzer,1984)等几个视角。然而迄今为止,只有诺贝尔奖(Zuckerman,1996;Friedman,2001)、奥斯卡奖(Levy,2003)、普利策奖(Hohenberg,1974;Shaw,1984;Volz & Lee,2013a;2013b),以及布克奖(Todd,1996;Strongman,2002)等少数声名显赫的文化奖项得到了较多研究,人们对绝大多数其他奖项知之甚少。所以,文化奖项对于我们“既是一种相当熟悉和平常的实践,也是一种高度陌生和隔膜的实践”。(English,2005:1)

目前,中国的官方新闻奖项的研究处于一种极不协调的状态:流于技术讨论的感想类文字相当多,但富有理论洞见的研究却极匮乏。前一类文章尤以新闻单位所办的业界期刊为发表阵地。同时,也出版了一些技术性

讨论的专书，旨在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一套赢取荣誉的“武功秘籍”。就理论研究而言，以《成名的想象》最值得称道。（陆晔，潘忠党，2002）。这篇民族志研究深描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如何在新闻建制内外去想象并取得专业名望。其中，长江、韬奋奖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了一条建制内的成名之途。当然，由于该研究焦点并不在新闻奖，因此他们只触碰到了一个庞大的官方新闻奖系统的很小一部分。此外，他们对于专业名望的讨论针对的几乎都是媒体精英，忽略了最广大的普通从业者。

本文希望回答三个问题。首先，官方新闻奖制度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经历了怎样一个演进过程？其次，它建立起了怎样一套规则系统？第三，评委会具有怎样的社会来源，从事着怎样一种荣誉把关实践？

本文采用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官方新闻奖“无法通过聚焦于一个单一的地点而加以解释”（Falzon, 2009: 1），因此采用多地点田野调查。2009年6至8月期间，笔者在三个省会城市进行了一轮集中的深度访谈，完成75份访谈，涉及78人，录音共计150小时。访谈了新闻从业者（67人）、新闻传播学者（8人）和专业组织的官员（3人）等三类人。对于本研究而言，适当的受访者是能够提供奖项如何运行、对新闻从业者有何效果、从业者们如何看待奖项等方面信息的那些人士。这是一个优质的样本：大多数新闻从业者获得过至少一项省级甚至全国性的官方新闻奖；所有学者和官员都担任过至少一届官方新闻奖评委。访谈是半结构化的，基于分别针对评委和新闻从业者的两份访谈提纲。大多数情况下，出于核对事实的目的，在同一家媒体中访谈了两人甚至更多。绝大多数访谈采取的是一对一的方式。在承诺保密的前提下，所有访谈都被录了音，事后进行了文本转录。在受访者中，男性占四分之三（76.9%）。在受访的新闻从业者中，大多数人从事新闻工作在五年及以上；大多数人供职于印刷媒体，尤其是报纸；绝大多数人供职于省市两级媒体。

笔者还收集了三套最高官方新闻奖的统计数据。第一套是全国好新闻奖（1980-1989）和中国新闻奖（1991-2013）全部获奖作品的数据库，第二套为长江韬奋奖（1991-2013）全部获奖者的数据库，第三套为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和长江韬奋奖的评委数据库。最后一套是混合性质的数据库，即总体和样本的混合数据库。笔者收集到了前两个奖项历届评委的基本信息，却无法得到1991-2005期间长江韬奋奖评委的有关信息，因此只能以

2006-2013期间的样本数据来做统计分析。这些数据是从《中国新闻年鉴》和中国记协网等多种途径得来的。

二、制度化过程

官方新闻奖制度分为两个时代。在八十年代，评奖权掌握在各级新闻学会手里；九十年代以来，评奖权易手到了各级新闻工作者协会。两个时代都服膺于同一种国家管理模式，即由各级宣传部门委托官办的专业组织来具体领导和实施官方新闻奖的荣誉生产。

1. 新闻学会时代

“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秩序，文化工作者也被一种反智主义的象征暴力——“反对成名成家”——所束缚。“文革”结束后不久，随着邓小平成为党和国家新的领导核心，一系列改革开始发动了起来：恢复高考制度，平反知识分子，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讨论真理标准，等等。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生产建设”的历史性决定，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正是社会结构方面的这些巨变为各种文化奖项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各种文化奖项是作为与“文革”相决裂的各种努力之一部分而出现的。文学奖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1978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刚恢复为文学战线的高峰组织之后不久，就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出了关于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通知。当时，文学界的领袖们急切地想要结束已经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文革文学”，呼吁作家们书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火热斗争”。（《人民文学》，1978：封三）这次评奖活动大获成功，“它首次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文学奖项”（孟繁华，2001：261）。最重要的是，文化评奖实践的国家管理模式得以发明了出来。通过模仿文学奖，首个新闻奖也很快得以建立。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同年8月，北京新闻学会与人民日报附属的《新闻战线》杂志共同发起了全国好新闻奖。此时，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才刚被恢复为新闻战线的高峰组织不久，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首个新闻奖项的创立者不是中国记协。接着，各省新办的新闻学会也纷纷创办了各自的省级好新闻奖；在那些尚未成立新闻学会的省份，省级好新闻奖则通常由省记协来组织实施。

新闻学会是顺应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要求而出现的，因而它不但在全

国范围内迅速地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而且新闻战线的第二个高峰组织——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也获准于1984年12月宣告成立。联合会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全国好新闻奖，并建立了为评奖提供经济支持的新闻研究基金会。新高峰组织成立后，官方新闻奖的国家管理模式最终得以形成。该模式的具体操作包括如下两点：（1）每个省级新闻学会作为高峰组织的强制性会员，负责举办本辖区的省级好新闻奖；（2）每个省级新闻学会按要求从本省当年的获奖作品中遴选出参评作品送去角逐全国好新闻奖。后来，九十年代以后由记协所重建起来的官方新闻奖系统几乎全盘继承了这一模式。

2. 记协时代

90年代末，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被取消，全国好新闻奖由此结束了十年短暂的历史，党和国家对新闻界进行了整顿。中宣部组织了全国省级党报学习班，国家主要领导人江泽民（1990）和李瑞环（1990a）分别为重申和恢复符合党和国家的需要的新闻秩序而发表了指导性的讲话。据中国记协一位官员回忆，“在新闻报道中，来自第一线的、生动的新闻少，大块文章、会议新闻多，报纸版面呆板冷漠，广播电视新闻不新鲜，不生动，不活泼”。（阮观荣,2008：50）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宣部决定重建新闻业的荣誉激励系统。

重建计划始于现场短新闻奖。1990年，中宣部提出评奖动议，委托中国记协来具体组织实施。这是中国记协首次独立地组织新闻评奖。（阮观荣,2008）首届现场短新闻奖带有强烈的试验性质，仅有21家首都新闻单位参加。在颁奖典礼上，一位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于该奖项寄予了厚望：“把社会气氛松弛开来，活跃起来，把精神振奋起来，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为完成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李瑞环,1990b：1）。随后中国记协又创办了几个全国性奖项，即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以及全国十佳新闻工作者。除第一个是作品奖之外，其余均为人物奖。2005年3月，中宣部因不满于全国性文化评奖秩序的混乱状况，出台严厉的评奖管理办法，将全国性的文艺、新闻和出版奖项从90个压缩为24个。其中，全国性新闻奖由14个减至2个：作品奖（中国新闻奖）和人物奖（长江、韬奋奖）各一个。

各省级记协也相应地建立了自己的作品奖和人物奖。有两点需特别指

出。首先,与中国新闻奖的“全新创办”不同,各省记协的作品奖几乎都是直接从省级新闻学会手里接管之后加以更名,即由“xx省好新闻奖”改为“xx省新闻奖”,以便与中国新闻奖保持一种对应关系。接管其实很容易,在大多数省份,尽管新闻学会与记协在名义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却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次,尽管各省级记协都创办了人物奖,然而绝大多数省份却无法效仿中国记协的命名方式。通常,只有当某人很好地人格化了党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时,他/她才可能被允许用来命名新闻奖。截至目前,只有戈公振、邵飘萍和海伦·斯诺三人分别被用来命名了江苏、浙江和陕西的人物奖。

三、规则系统

规则是用以调节个体言行和不同个体之间的互动的准则、规定与期望。(March, Schulz & Zhou, 2000: 7-8) 评奖是一种典型的由规则所支配的文化行为,而任何一套评奖规则又总是颁奖机构的象征权力之外在显现。官方新闻奖具有“双重赞助”、“推荐单位”与“挂钩”等几种基础性规则。第一个是半显半隐的规则,后两者为显性规则。

1. 双重赞助制度

这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当时全国好新闻奖的评选对于资金短缺的北京新闻学会构成了巨大压力,于是双重赞助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而得以发明出来。所谓“双重”,就是一方为主办方,另一方为承办方。由于各省市新闻学会的纷纷效仿,双重赞助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规则。后来,记协时代的新闻奖系统也全盘继承了该规则。

主办方是固定的,由创办奖项的专业组织担任;承办方是选择性的,几乎每次都不同。主办方负责制定评奖条例和程序,组建评委会,以及为获奖证书盖章等事项;而承办方则负责收集参评材料,确定评选会的地点,并做好会议的接待、服务,甚至会后的考察,等等。承办方几乎总要为一大笔花费埋单。一次评奖有一个或多个承办方。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何称双重赞助是一个半显半隐的规则呢?主办方与承办方各自的职责都有公开而清楚的划定,此之谓显;承办方的付出通常会得到某些荣誉上特殊照顾,此之谓隐。

双重赞助制度具有多重社会控制功能。其一,它将主办方从经济压力

中解放了出来。其二，它为承办方提供了一个与某些个人和机构建立或加强策略性关系的机会。其三，当承办方把奖项带到北京以外的某个地方或者省会城市以外的某个地方，这可以给人们形成一种全国性或全省性覆盖的印象。

2. 推荐单位制度

在对待参评作品或参评者的规则上，全国性的官方新闻奖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经历了一种从完全开放到相对封闭的转向。在全国好新闻奖的初期，评奖机构热情地鼓励全国的新闻从业者自主地报送参评作品。然而，随着从业者追求职业荣誉的热情被迅速地激发起来，评奖机构引入了一个新规则来进行调控，即推荐单位制度。从此，从业者不能再直接向评奖机构报送作品，改由各推荐单位负责辖区内的初评工作，并按照配额报送优秀的参评作品。推荐单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评奖机构将辖区内的媒介机构以行政区划单位为基础，划分出若干推荐单位。就中国新闻奖和长江韬奋奖而言，中国记协把全国分成几十个推荐单位：一方面，各省记协天然就是一个推荐单位；另一方面，为了承认主要的中央级新闻组织（如新华社）的特殊地位，它们中的每一个也是一个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制度具有多重社会控制功能。其一，通过为各推荐单位规定配额，主办方将参评作品或参评者的总量以及由此而来的评委的工作量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上。其二，它是一个“过滤器”，排除那些在专业和政治上不适当的参评作品或参评者。第三，一个推荐单位把辖区内的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打包成了一个“团体”，建构出了一种集体身份。例如，当一名省级媒体的记者获得了中国新闻奖，荣耀既属于他自己及其新闻机构，也属于作为推荐单位的省记协和作为该新闻机构之主管单位的省委宣传部。第四，推荐单位制度还激发出了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因为中国记协可以声称全国的新闻机构都参与到了它的荣誉游戏之中。当然，该规则也存在负功能。一是，当从业者与评奖机构之间的关系被推荐单位中介化之后，参评作品或参评者的多元化程度有所降低。二是，推荐单位的初评结果难免因各种压力——揣测或迎合更高级评选的偏好，平衡辖区内不同新闻机构之间的荣誉机会，以及出于与其他推荐单位竞争荣誉的需要——而有所扭曲。

3. 挂钩制度

这一规则最初是作为一种自发的策略而出现。八十年代初,一些省级新闻学会从省级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中遴选出一部分送去角逐全国好新闻奖,于是就把省级和全国性的奖项挂起钩来。此乃垂直型的“同类挂钩”。八十年代中期,新闻学会联合会给各省规定全国好新闻奖的参评配额并把初评权下放给省级新闻学会,这进一步推动挂钩实践走向制度化。九十年代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水平型的“异类挂钩”,它发生在不同种类的奖项之间,把作品奖和人物奖挂起钩来。这种挂钩同时存在于两个层次:其一,中国记协规定,只有那些至少获得过一项中国新闻奖的人才有资格参评长江、韬奋奖;其二,各省级记协也相应地规定,只有那些至少获得过一项省级最高作品奖的人才有资格参评省级最高人物奖。

挂钩制度同样有其社会控制功能。其一,异类挂钩刺激和延长了获奖者对于职业荣誉的抱负,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延迟性的”激励结构。2010年,人民日报广东分社社长王楚角逐长江、韬奋奖时提交的代表作是一条二十多年前夺得特等奖的新闻。其二,同类挂钩带来了某些话语的和行为的后果。它通过把省级奖纳入国家最高奖项的主导话语体系——尤其是让前者将后者的荣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或者最正当的,确保了记协垄断性的职业荣誉权威。行为上,它使得每个省级记协都采取一套相同或相似的评奖程序。第三,两种挂钩一起让获奖者在荣誉游戏之中的“累积优势”(Zuckerman,1996)得以正当化和制度化。

四、评委及其把关实践

1. 评委来源

全国好新闻奖在八十年代早期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评委来源模式。后来,它被中国记协所重建的新闻奖系统全盘继承了下来。具体而言,官方新闻奖的评委会会有四种来源:专业组织的官员、媒体组织的领导、党政部门(如宣传部)的官员,以及新闻传播学者。

表一显示了1980-2013期间中国最高官方新闻奖评委会的社会来源。在1980-2010期间,媒体领导最经常地坐到作品奖的评委会上;党政官员相对更经常地参与评选记协时代的新闻奖,且参与作品奖(14.0%)和人物奖(14.1%)的机会几无差异;新闻传播学者则很少获邀评选人物奖,

而是相对更经常地参与作品奖。卡方检验显示,记协时代的作品奖和人物奖在评委来源上差异显著($\chi^2 = 120.77, p = 0.001$)。2010年,中国记协决定,中国新闻奖继续一年一评,而长江、韬奋奖每两年一评,两奖共用一个评委会。中国新闻奖最近三年的评委构成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chi^2 = 99.39, p = 0.000$),而长江、韬奋奖却并无显著变化($\chi^2 = 3.98, p = 0.263$)。

表一: 1980-2013期间中国官方最高新闻奖的评委来源之分布状况

	全国好新闻奖 (1980-1989)	中国新闻奖 (1991-2010)	长江、韬奋奖 (1991-2010)	中国新闻奖 (2011-2013)	长江、韬奋奖 (2012)
专业组织官员	26.9 (137)	18.2 (232)	50.9 (112)	45.6 (120)	46.5 (40)
媒体领导	47.3 (241)	54.4 (694)	25.5 (56)	34.6 (91)	32.6 (28)
党政官员	7.3 (37)	14.0 (179)	14.1 (31)	6.1 (16)	5.8 (5)
新闻传播学者	18.5 (94)	13.3 (170)	9.5 (21)	13.7 (36)	15.1 (13)
合计	100.0 (509a,b)	100.0 (1275a)	100.0 (220a)	100.0 (253)	100.0 (86)

注:

1. a 总数为“人次”,而不是评奖委员会上不同评委的数量。b 有225个缺失值,占30.7%。
2. 当一位评委拥有不止一种职衔时,取第一个职衔。

2. 评选会

评选会是一个核心的荣誉把关舞台。这里,对评选会的开放性、不同的评委角色、对承办方的“照顾”、“关系”游戏,以及荣誉“特殊主义”等五个方面加以分析。

几乎任何评奖都面临着一个是否以及如何把评选会开放给局外人的问题。诺贝尔奖在科学院层次上的评选(Friedman,2001)和普利策奖在委员会层次上的讨论(Bates,1991)都是绝对保密的。中国的官方新闻奖也有其保密政策,但评奖机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对局外人开放评审会。一种措施是“程序透明”。近年来,各个层次的官方新闻奖往往都采取某些方式提前公布评奖条例。不过,评奖机构只是单纯地公告,并不会根据公众的反馈而改变已出台的条例。另一种更实质性的措施是“旁听”机制。有些评奖机构允许每个参评单位派一个“观察员”去旁听评选会。观察员有权

提问,但无投票权,在评委们决议时须得离场。该机制的初衷本来是为所有参评单位创造一个公平的学习机会,并趁机秀一下新闻奖的形象,然而它却带来了某些非预期性后果。其一,观察员有时会当场目睹到评奖舞弊行为的发生,无论轻微抑或严重都可能令他们对奖项产生负面印象。一名电视记者(z5)有一年碰巧目睹自己的作品遭遇了不公正对待,这直接导致了他对于评选会的犬儒主义态度。其二,观察员的在场可能令评委出于“印象管理”(Goffman,1959)的需要而改变其行为模式。其三,更糟糕的是,某些观察员牟取荣誉,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贿赂评委而扭曲了评奖结果。还有一种措施就是“公示制度”。这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荣誉的舞弊行为虽是一种预防,然而过多的舞弊行为则会引发普通公众和新闻从业者的犬儒主义态度。

再来看评委角色的问题。不同来源的评委在评选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一,专业组织的官员是评奖事务的组织者,决定谁将获邀进入评奖委员会。其二,党政官员是“政治权威”,通常为评选会设定议程,而其他参与者几乎不会去挑战其权威。受访的新闻学者们对于党政官员角色的看法不一。一位常务副院长(z30)称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另一位记者出身的教授(z28)却认为,“他们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担任评委会的领导,特别是在那些关系到政策方面的事务上设定着议程。”同时,这些官员可能会在评选会上发表“指导性的”讲话,但专业组织的官员们往往会为他们代拟讲话稿(z19)。其三,媒体领导作为“专业权威”,他们在评选会上的话语权并不平等,原则上取决于所在媒体的行政级别。一位学者评委(z31)发现,行政级别不高的广州日报尽管在报业市场上叱咤风云,它在广东新闻奖的评选会上却只能充当一个小配角。一位省记协主席(y19)说,本省地市级媒体的领导们甚至一度被排斥在省级新闻奖的评选会之外。最后,新闻学者被邀请来充当“学术权威”。2013年11月7日,在为配合中国新闻奖颁奖典礼而播出的《焦点访谈》中,记者出身并已多次担任评委的申启武教授作为唯一出镜的学者,以专业而权威的口吻解释了新华社长篇通讯《三西扶贫记》何以能夺得特别奖。必须承认,学者评委要树立一种面向普通公众的权威形象相对容易,但要面向作为专业公众的新闻从业者来树立该形象则比较困难,后者往往因为前者缺乏实际从业经验而看低他们。大多数受访的新闻从业者对于学者能够成为合格的评委深

表怀疑。尽管如此，学者们能否赢得尊重主要还是取决于评选会上的实际表现。一位擅长从学术视角来透视新闻实践的学者（y20）就在本省的评选会上赢得了好名声。与此同时，大多数受访的学者强调“坚持原则”对于学者身份的重要性。一名教授（y21）称：“我们是局外人……我们应当公平公正，否则我们就不配为学者。”有时，学者们亦需发展出一些小策略来应对各种外来压力。这位教授面对那些说情的电话或短信时，只说“我知道了”，并不作任何许诺。由于学者们总会面对来自于其他评委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努力搞懂那些明文和非明文的游戏规则。如今，评委会的常客们多半处于一种过度社会化的状态。

再来看评选会的一个潜规则。官方新闻奖通常会对给予承办方的参评者/作品某些特殊对待，这说明在“经济”与“荣誉”之间存在某种转换关系。“照顾承办方”的潜规则是旨在纾解评奖机构经济压力的双重赞助制度的伴生物。大多数受访的新闻从业者相信承办方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评委们的特殊照顾。不管情况是否属实，这种感知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效果。评委们对于潜规则并不否认。一名教授（y21）声称：该潜规则意味着承办方至少能获得一个一等奖；若它未能如愿，或许是因为会议地点、酒店或膳食等不合评委们的心意。另一位教授（z30）则说，若其他条件旗鼓相当，承办方的参评作品的确更占优势。大多数时候，评委们很清楚该如何去照顾承办方而不露任何痕迹。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潜规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整体的荣誉机会机构，他却引发了很多新闻从业者对于官方新闻奖的不信任。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官方新闻奖很难成为一种公平和公正的荣誉游戏，因为所有评委都身陷于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关系网。在评选会上，绝大多数评委都在努力最大化各自推荐单位的荣誉收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推荐单位普遍存在一种“锦标赛心态”，拼命地寻求比自己过去更好的和比其他推荐单位更好的荣誉表现来向党和国家证明自己不俗的新闻宣传业绩。为此，评委们几乎总是会动用与其他评委的各种个人关系。如果两位评委碰巧是朋友、亲戚或者熟人，如果他们是同学、同事、战友或者师生，那他们在评选会上几乎总是会互相帮衬。有时，即便是两个互不相识的评委也会于邂逅之际创造出这样那样的可资利用的关系（z28）。除了

这些预存性或偶发性的“水平性的”关系之外，有些人还能动用到“垂直性的”关系。一种典型的表现是，请评奖机构的官员或者其他党政官员给予某些微妙的帮助。例如，请他们在评选会上特别提及某件作品，或者对它表达带有倾向性或暗示性的“私人看法”。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官方新闻奖的荣誉机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秉承的不是普遍主义的而是特殊主义的原则（Parsons, 1964）：荣誉机会的多寡大体上取决于新闻机构的社会出身——“行政级别”——之高低。行政级别从部、厅、处到科四级，每级内部又分正、副两层。媒体组织也遵循该等级体系。少数主要的中央级新闻单位行政级别最高，担负着最重要的新闻宣传任务，因此全国性新闻奖天然地就偏向他们。一位资深新闻人的公开信中就提及了中国新闻奖评选过程中的特殊主义，谓之“‘官本位’预置”，即“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李大同, 2008: 362）绝大多数受访的新闻从业者相信，若两件作品旗鼓相当，地方媒体的荣誉等级通常更低。近来，中国记协已意识到中国新闻奖和长江韬奋奖评选过程中特殊主义的严重性，开始有意识地采取措施试图解决它。

表二显示，最高官方新闻奖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呈严重的偏态分布，证明了特殊主义的存在。在作品奖方面，尽管地方新闻单位获得了62.6%的全国好新闻奖和65.1%的中国新闻奖，全国性新闻单位却在高级别奖项（即特等奖和一等奖）上占有明显优势。在新闻学会时代，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各夺得5.2%（101）和5.1%（99）的全国好新闻奖；在记协时代，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获得了3.6%（178）、3.2%（160）、2.8%（140）、2.4%（116）和2.1%（102）的中国新闻奖，合计14.1%。同样地，作为最高人物奖的长江、韬奋奖也为全国性新闻单位所统治。在迄今全部234名获奖者中，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央广和解放军报是大赢家，各占6.8%（16）、6.4%（15）、6.0%（14）、5.1%（12）和5.1%（12），共计29.5%。而级别较低的新闻单位则极其弱势。迄今为止，仅一人来自于县级媒体（0.5%）。地级市新闻从业者的获奖机会也很渺茫。中宣部官员对宝鸡日报宁丽君的赞扬印证了这一现实：“宁丽君来自陕西地市报，获得韬奋奖，不容易啊！”。（卜元, 王鹏, 1996: 42）

表二：1980-2013期间最高官方新闻作品奖的机会分布状况

名称	等级	地方媒体	全国性媒体	总计
全国好新闻奖 (1980-1989)	特等奖	35.5 (11)	64.5 (20)	100.0 (31)
	一等奖	51.0 (330)	49.0 (317)	100.0 (647)
	二等奖	64.9 (526)	35.1 (285)	100.0 (811)
	三等奖	77.2 (338)	22.8 (100)	100.0 (438)
	其他	73.7 (14)	26.3 (5)	100.0 (19)
	总计	62.6 (1219)	37.4 (727)	100.0 (1946)
中国新闻奖 (1991-2013)	特等奖	10.0 (5)	90.0 (45)	100.0 (50)
	一等奖	54.1 (374)	45.9 (317)	100.0 (691)
	二等奖	60.4 (969)	39.6 (636)	100.0 (1605)
	三等奖	72.1 (1859)	27.9 (721)	100.0 (2580)
	总计	65.1 (3207)	34.9 (1719)	100.0 (4926 a)

注：

1. $\chi^2 = 89.40, p = 0.000$ (全国好新闻奖); $\chi^2 = 174.16, p = 0.000$ (中国新闻奖)。

2. a 第十三和第十四届的新闻论文奖共计38篇。由于只取得了论文刊载方面的信息，而未获得参评机构的信息，暂作缺失值处理。

在省级官方新闻奖的评选中，主要中央级新闻单位也经常享有特殊主义，部分原因在于某些省级部门希望借此与这些单位的分社或记者站建立良好的关系。吊诡的是，分社或记者站的记者们尽管受到了特殊礼遇，然而却往往对于省级新闻奖不屑一顾。一位新华社记者（y9）对此流露出了浓厚的精英主义心态：“你不能把泥鳅拉得跟黄鳝一样长……跟[地方记者们]进行比较就是在降低我们的身价。”相反，很多地方新闻从业者却又抱怨，中央级媒体同行参评省级奖减少了自己的荣誉机会。

五、结语

本文对于作为一种职业荣誉制度的中国官方新闻奖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具体回答了官方新闻奖的制度化演进过程、规则系统和评委的社会来源及其把关实践等三个研究问题。

那些对于国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从根本上决定了新闻奖的制度进

程。官方新闻奖虽然可分成两个时代——新闻学会时代和记协时代，但它却始终按照一种国家支配模式在运行，即由专业组织充当党和国家的代理者来具体组织职业荣誉的生产。

官方新闻奖有着一套独特的规则系统，由此形塑了荣誉的机会结构。本文具体分析了双重赞助、推荐单位和挂钩等三种基础性的规则。每一种规则都发挥着某些社会控制功能，有的规则也具有某些负功能。其中，双重赞助制度虽然纾解了主办方的经济压力，但也带来了“照顾承办方”的伴生性后果。推荐单位制度反映了评奖机构在参评作品的来源方面从开放到封闭的一种态度转变。挂钩制度既为新闻从业者创造了一种“延迟性的”激励结构，也令获奖者在荣誉游戏中的“累积优势”得以正当化和制度化。

官方新闻奖评委会具有稳定的社会来源。评委来自于专业组织的官员、党政机关的官员、媒体组织的领导，以及新闻院系的学者。不同评委在评选会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必须进行社会化，以便培养起一种“游戏感”；评奖委员会上的常客们往往处于一种过度社会化的状态。评委们很清楚该如何不露痕迹地去照顾承办方。他们或积极或消极地玩着“关系”游戏。大多数受访者都对评奖结果的公正性表示怀疑，有些人甚至对评选过程污名化为“分猪肉”。官方新闻奖的荣誉机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秉承的是特殊主义的原则。

（责任编辑：杨雅）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Allen, M. P. & Lincoln, A. E.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cultural consecration of american films. *Social Forces*, 82 (3), 871-894.
- Allen, M. P. & Parsons, N. L. (2006).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ame: achievement, recognition, and cultural consecration in basebal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5), 808-825.
- Bates, J. D. (1991). *The pulitzer prize*. New York, NY: Carol.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Haacke, H. & Johnson, R. (1995). *Free exchange*.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Cole, J. R. & Cole, S. (1973).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le, S. & Cole, J. R. (1967). Scientific output and recognition: a study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reward system in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3) 377-390.
- English, J. F. (2005). *The economy of prestige: prizes, awar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alzon, M. A. (ed.)(2009). *Multi-sited ethnography*. Burlington, VT: Ashgate.
- Friedman, R. M. (2001). *The politics of excellence: behind the Nobel Prize in science*. New York, NY: Times Book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Goode, W. J. (1978). *The celebration of heroes: prestige as a control syste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gstrom, W. O. (196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Hohenberg, J. (1974). *The Pulitzer Prizes: a history of the awards in books, drama, music, and journalism, based on the private files over six decad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vy, E. (2003). *All about Oscar: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academy awards*. New York, NY: Continuum.
- March, J. G., Schulz, M. & Zhou, X. (2000). *The dynamics of rules: change in written organizational cod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ton, R. K. (1957). Prioriti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 (6), 635-659.
- Parsons, T. (1964).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Shaw, D. (1984). *Press watch: a provocative look at how newspapers report the news*. New York, NY: MacMillan.
- Strongman, L. (2002). *The booker prize and the legacy of empire*. Amsterdam: Rodopi.
- Todd, R. (1996). *Consuming fictions: the booker prize and fiction in Britain toda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er.
- Volz, Y. Z. & Lee, F. L. (2013a). What does it take for women journalists to gain

-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Gender disparities among Pulitzer Prize winners, 1917-2010.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0 (2), 248-266.
- Volz, Y. Z. & Lee, F. L. (2013b). Who wins the Pulitzer Prize in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Cumulative advantage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14 (5), 587-605.
- Walzer, M. (1984).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Zuckerman, H. (1996). *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卜元,王鹏(1996). 韬奋精神: 这就是她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记韬奋新闻奖获得者, 宝鸡日报记者宁丽君.《报刊之友》,(2),39-42.
- [Bu, Y. & Wang, P. (1996). The Taofen spirit is what she excites us: a story of Lijun Nin, the Baoji Daily reporter and the Taofen prize-winner. *Friend of the Press*, (2),39-42.]
- 常秀英, 张君昌,阮观荣(2001).《争获新闻奖指南: 新闻评奖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Chang, X., Zhang, J. & Ruan, G. (2001). *A Guide for Winning Journalism Priz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Journalism Awarding*. Beijing: China Broadcasting Press.]
- 胡绩伟(2006).《胡绩伟自选集: 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
- [Hu, J. (2006). *Selected Works of Jiwei Hu: To Publish a Newspaper People Like*. Hong Kong: Highbrow Culture Press.]
- 江泽民(1990).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新闻战线》,(3),3-6.
- [Jiang, Z. (1990). On questions of the Party's journalism work. *Journalistic Front*, (3), 3-6.]
- 李大同(2008).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核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载陈婉莹,钱钢(编),《中国传媒风云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 [Li, D. (2008). A letter to the editor-in-chief Erliang Li and the China Youth Daily's editorial board regarding the new policy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Chen, W. & Qian, G., *The Winds and Clouds of China's Media*. Hong Kong: Sky and Earth Press]
- 李瑞环(1990a).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新闻战线》,(3),7-14..
- [Li, R. (1990a). Insisting on the guideline of putting positive propaganda first. *Journalistic Front*, (3), 7-14.]
- 李瑞环(1990b).在“现场短新闻”颁奖会上的讲话.《中国记者》,(7),1.
- [Li, R. (1990b). The speech at the ceremony of on-the-spot news prize. *China's Journalist*, (7), 1.]

陆晔,潘忠党(2002). 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新闻学研究(台北)》, (71), 17-59.

[Lu, Y. & Pan, Z. (2002). Imagining professional fame: construc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 (71), 17-59.]

孟繁华(2001). 《想象的盛宴》.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Meng, F. (2001). *The Feast of Imagination*.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ress.]

人民文学(1978). 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 《人民文学》, 10, 封三.

[People's Literature. (1978). The notice on launching the 1978 excellence prize for short stories. *People's Literature*, (10), inside back cover.]

阮观荣(1999). 《怎样争获新闻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Ruan, G. (1999). *How to Win Journalism Prizes*. Beijing: People's Daily Press.]

阮观荣(2008). 新闻奖的前奏曲. 《青年记者》, (7), 49-51.

[Ruan, G. (2008). A prelude to journalism prize. *Young Journalist*, (7), 49-51.]